史事考证

《清世祖实录》的纂修及康熙初期的政治斗争

乔治忠 侯德仁

清朝自开国伊始，修史活动多有具体的、直接的政治需要。清太宗即位多年之后，才着手纂修清太祖朝实录，其目的不仅是宣扬后金与努尔哈赤的立国创业之功，还借此突出皇太极本人的地位，连实录名称也将其生母写上，从而配合皇太极强化君主集权以及称帝改国号的进程。顺治帝入关后六年，亲政之际才纂修清太宗朝实录，此间有多尔衮令人“篡改”实录的政治斗争，此为日后多尔衮与同党刚林的一项罪状。而顺治二年宣布纂修《明史》亦只是借此渲染明朝已经灭亡，清廷接续正统，并笼络已降附的汉官与绅士而已，实际纂修工作成效甚微。康熙四年再开《明史》馆，乃是在“庄氏史狱”之后，面对私修明史之风，官方作出一个既压制又诱导的政治姿态。《清世祖实录》纂修于康熙初年，是清朝实录中第一部体例、书法规范化的官方正式定本。考察这部实录的纂修过程，对研究清朝官方史学活动及其与政治的联系，是十分必要的。

一、《清世祖实录》纂修前的政治背景

康熙六年九月，诏命以大学士班布尔善为监修总裁官，组成《清世祖实录》馆。“（九月）二十日赐宴礼部，诘旦开馆”①，《清世祖实录》纂修正式开始。其时，康熙帝亲政仅两个月，便迅速诏命臣下纂修世祖实录，可见他对世祖实录纂修的重视。然而，《清世祖实录》的纂修却是在清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十分激烈的背景下进行的。

清朝入关，定鼎中原。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是保持满洲的所谓“淳朴旧制”，还是改革政治体制以适应内地的社会文化状况？

入关后，以多尔衮为首的清统治者为了站稳脚跟、巩固统治地位，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的“汉化”措施。如为崇祯帝发丧，按明朝的官制组织各级政权，开科取士，多尔衮还亲自“谒先师孔子庙行礼”，继续笼络和重用汉官等等。然而，就是这些措施，却引起了满洲贵族中保守势力的严重不满。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死去，顺治帝亲政，保守派势力一度抬头。他们要求顺治帝“效法太祖、太宗”，与诸王贝勒“讨论政事得失”，并以祖先“常恐后世子孙弃淳厚之风，沿习汉俗”②的训诫来提醒顺治帝。这表现了保守势力企图维护满洲贵族特权和抵制汉族文化的努力。可是，已经大权在握的顺治皇帝颇想有所作为，仍然重用汉族官吏，提倡汉族文化，还亲视太学，主持

[收稿日期] 2000—03—15
[作者简介] 乔治忠（1949—），男，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天津 300871；侯德仁（1975—），男，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天津 300371

殿试，开经筵日讲，注重阅经读史，并且多次遣官“致祭先师孔子”，倡导学习儒家传统文化。顺治后期，他实行了一系列颇为大胆和有魄力的改革措施。顺治十五年七月，顺治帝敕谕礼部：改内三院为内阁，“除去内三院秘书、弘文、国史名色，大学士改加殿阁大学士，仍为正五品”，并另置“翰林院，设掌院学士一员，正五品”、“其余学士亦正五品”[③]，进一步采用了明朝的中枢机构体制。顺治十七年六月，顺治帝诏准山东道监察御史顾如华的上疏，罢祭辽太祖、金太祖、元太祖于历代帝王庙，理由是这些少数民族创业之君“原未混一天下，且其行事亦不及诸帝，不宜与祭”。同时，诏命“商中宗、商高宗、周成王、周康王、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俱入庙并祭”，以其为“守成令主”。[④]这实际上是表明清朝承袭的是内地华夏政权的统绪，是从商周以来一脉相承的正统政权，贬抑了辽、金、元政权的开创者，在观念上抛弃了少数民族上层的偏狭心理。历史视野扩展为整个中国疆域，真正是政治历史观的一大转变，思想与行为在当时都是激进的“汉化”倾向。

然而，顺治帝于顺治十八年正月（1661年2月）逝世。康熙帝八岁冲龄即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辅政。四大臣是满洲贵族中民族狭隘性比较强烈的保守派。他们对多尔衮执政时期，特别是顺治后期一系列加速汉化、信用汉官的措施不满，迫不及待地要将改革的体制拉向后退，竟借撰拟顺治帝遗诏之机发难，让已死的顺治帝“自责”犯了十四项大的过错。例如“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以及“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而委任汉官……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⑤]，等等。因此，他们以“率祖制，复旧章”[⑥]为旗帜，恢复满洲旧制，下令撤销内阁和翰林院，恢复内三院制度[⑦]，增加满洲大学士人数，提高满官地位，压制汉官。与此同时，清廷还制造了“哭庙案”、“奏销案”和“庄氏史狱”，打击汉人官僚、绅士和文人。“哭庙案”系顺治十八年六月顺治帝治丧期间江南诸生借“哭临”之机聚众，要求罢逐滥用非刑、强征暴敛的吴县知县。事上闻清廷，于是遣官审理，斩为首诸生金人瑞等十八人。“奏销案”亦为是年六月，江宁巡抚将赋税最重的苏、松、常、镇四府及溧阳县未完钱粮的缙绅之家一万三千多名造册申报，清廷竟下令严惩，分别撤销官职、革去功名。一甲第三名进士叶方蔼仅偶欠一文钱，亦被革去功名，故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流言。最为惨烈的是顺治十八年十二月案发、康熙二年结案的“庄氏史狱”。因浙江富户庄廷鑨雇人编辑明史，中间采用南明年号，且收录指斥清朝的诗文。被人告发，酿成大狱，株连甚广，包括不少初时处理此案不力的汉人地方官吏。据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十一记载，文人、学者、名士二百二十一人被杀[⑧]，其中多为并未参与其事，乃庄氏私下列名于参校名单者。这些案件皆非出自年少的康熙帝本意，乃满洲守旧派伺机打击汉人官绅的事件。于是，清政权内满汉臣僚关系紧张，汉人及主张习从汉人文化的满洲官员都被压抑。然而，朝中汉官仍采取迂回方式与守旧的满洲贵族相抗衡，寄希望于年轻的皇帝。就在康熙二年四月，福建道御史王鼐上疏请求皇帝“宜及时举行经筵，请于满汉词臣中，择其老成渊博者，授为讲官。将经史有关治道之言，採辑翻译，以备进讲。并请早修三朝实录，撮其要旨，编为《祖训》一书，每次同经史进讲。”[⑨]此后，这种建言皇上读经阅史以及修书的疏奏屡出不断，是汉官首先在最具优势的思想文化方面发起攻击，以影响皇帝的思想取向。掌权的守旧派虽不喜欢，也只能被动地“报闻”而已。

四辅政大臣中，索尼年老，遏必隆比较软弱，苏克萨哈相对望浅，惟鳌拜跋扈。他大力培植私党，排陷异己，“所喜者荐举，所恶者陷害”，“文武各官，尽出名下”[⑩]。这必然与皇权发生尖锐的矛盾。随着康熙帝年龄增长，亲政在即，汉官对满洲守旧派的反攻也日见激烈。康熙六年六月，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上书，指责在鳌拜集团把持下的政治腐败，“政事纷更而法制未定”，“职业隳废，而士气日靡”，“各衙门大小臣工，大率缄默依阿，绝少实心任事之人”，“学校废弛，而文教日衰”，“风俗僭侈，而礼制日废”。他建议从贵族近臣开始，改革朝政，一切施政以儒学为根据，请

求皇帝“隆重师儒，兴起学校”，并责成学道“统率士子，讲明正学，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希望康熙帝“征诸六经之文，通诸历代之史，以为敷政出治之本”⑪。这分明是针对鳌拜集团而发，抨击了辅政时期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康熙帝亲政以后，鳌拜仍把持实权，飞扬跋扈。于是，康熙七年，熊赐履又上言：“朝政积习未除，国家隐忧可虑，”并且宣扬程朱理学的政治作用，请求皇帝“时御便殿，接见儒臣，讲论政治”⑫。疏入，鳌拜震怒，要求严惩熊赐履，康熙帝坚持不允。这表明皇权与守旧辅政大臣的决战即将开始，《清世祖实录》的纂修是这场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清世祖实录》纂修的发起

康熙六年七月，皇帝亲政，当月就有礼部尚书黄机奏请纂修《清世祖实录》。康熙帝立即颁下谕旨：“皇考世祖章皇帝励精图治，敬天法祖，无事不以国计民生为念。鸿功伟业，载在史册，理宜纂修实录，垂示永久，以昭大典。这本说的是，著详议具奏”⑬。向守旧派反击，从重新评价清世祖朝政治开始，是最为方便的。纂修实录，目的即在于此。在这个谕旨中，康熙帝实际上已定下基调，否定所谓“清世祖遗诏”中对世祖朝政体改革的诋毁。

康熙六年九月，实录馆正式组成，大学士班布乐善为监修总裁官，巴泰、图海、魏裔介、卫周祚、李霨为总裁官。至康熙七年正月，康熙帝为顺治帝立“孝陵神功圣德碑”，亲撰碑文，盛赞其父的政治举措，将守旧辅政大臣炮制的所谓“遗诏”几乎逐条予以驳斥。兹将两文加以对照，列举如下：

1、碑文称：“各衙门规制事例，祗奉太祖、太宗成法，治具毕张”，驳斥了“遗诏”中第一条过失：“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

2. 碑文称：“视满汉如一体，遇文武无重轻。”驳斥“遗诏”第四、五条过失：“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以致情谊睽隔，友爱之道未周。”“满洲诸臣……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

3. 碑文称：“丁亥、己亥再兴会试，间广额数，以罗人才”。驳斥“遗诏”第六条过失：“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未能随才器使，以致每叹乏人。”

4. 碑文称：“破故明人臣朋党之习。尚廉正，黜贪邪。时时甄别廷臣，以示激劝”。驳斥“遗诏”第七条过失：“诚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

5. 碑文称：“素衣菲食，不兴土木之工”，驳斥“遗诏”第八、九条过失：“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发施。”“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之所不及。”

6. 碑文称：“崇俭去奢，克勤无逸”，驳斥“遗诏”第十条过失：“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体止情，诸事踰滥不经。”

7. 碑文称：“阉寺不使外交，立铁牌示禁”，驳斥“遗诏”第十一条过失“委用宦寺，……与明无异。以致营私作弊，更踰往时。”

8. 碑文称：“皇考惟是兢业祇慎，无一日自遐逸也”，驳斥“遗诏”第十二条过失：“性耽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以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

9. 碑文称：“下诏求言，虚怀纳谏”，驳斥了“遗诏”第十三、十四条过失：“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既知有过……徒尚虚文，未能省改。”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在碑文中还提到了其父顺治帝“勤学好问，择满汉词臣充经筵日讲官于景运门内。建直房令翰林官直宿，备顾问。经书史册，手不释卷”。这从侧面对顺治帝积极学习汉族地区传统思想文化与亲近汉官作出了肯定，也预示了自己崇儒学、用汉官的施政方针。从这篇御制碑文的发布时机可以看出，为顺治帝树碑撰文乃与纂修实录的活动相配合，实际上是向鳌拜等守旧势力发动的一场政治攻势，它向所有文武大臣显示了皇帝的思想意旨与政治取向，其政治影响及舆论作用应是十分巨大的，而且所采取的修实录、撰碑文方式，使对方无法阻挠和防御，斗争策略也是很高超的。至此，鳌拜等守旧派已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

三、《清世祖实录》的改修及其影响

发起《清世祖实录》的纂修和撰述顺治帝《孝陵神功圣德碑文》，在政治上、舆论上夺取了向守旧派斗争的主动权。但鳌拜等手中还掌握许多实权，党羽与阿附者充斥清廷各个衙门，连实录馆监修总裁官班布尔善也是鳌拜同党，皇帝在《清世祖实录》纂修问题上的意旨很难完全贯彻，纂修具体环节上必然继续存在斗争。康熙七年九月，熊赐履再次上疏批评朝政，言辞激烈，其中有"修实录，率旧章，法祖矣，而觐扬光烈，果无敎于显承否也；早临午御，勤政矣，而章程之丛脞犹烦也；蠲荒赈乏，恤民矣，而井闾之疾苦犹剧也；诏修太学矣，而辟雍之钟鼓不闻；疏请经筵矣，而文华之几案未设；清铨叙，而吏道益杂；肃官箴，而废弛滋甚。"⑭语含嘲讽，迂回地揭示"率旧章"与"觐扬光烈"在修实录中的冲突，抨击了《清世祖实录》的纂修现状，道出了其中思想斗争的隐情。

《清世祖实录》纂修中的具体情节，属于宫廷秘事，资料不存，史册缺载，难于详考，清初申涵盼略有记载，可以从中窥见一鳞半爪。申涵盼（1638—?），永年县人，出身于当地巨族，康熙朝进士，为翰林官。曾参修《广平府志》，纂修《永年县志》。康熙六年起参修《清世祖实录》、《清太宗实录》，在馆始终其事。撰有《忠裕堂集》，收于《畿辅丛书》。《忠裕堂集》中有《纂修两朝实录记》一文，乃据其亲身经历于《清世祖实录》告成时追记，为第一手史料，当翔实可信。

据申涵盼记述，《清世祖实录》馆于康熙六年九月二十日开馆，预计约一年可以脱稿。"然人各为事，事各为文，文既不贯融，事亦多舛错，稿出而复毁者屡矣。久之条例乃定，忽执政者以纂修员数不足，有借才别署之请，复增数员，大率皆拔自闲曹及起废诸官也。"这说明《清世祖实录》的初纂之际，组织工作十分不力，纂修甚无章法，竟然"久之条例乃定。"随后又增员赶修，显得不很郑重。"甫一年，草创粗具，而冗复遗漏者尚多，其讨论润色之功百倍于起稿时。忽执政者以实录将竣，无庸此多员为，遂罢廪给，汰职事"。这段记载说明仓促写成草稿，留下了大量需要讨论、修订和补充的问题，但"执政者"竟然撤消经费，裁减人员，乃存心不令《清世祖实录》认真地纂修完好，康熙帝的意旨当然也无法施行于纂修之中。

《清圣祖实录》记载此事曰：康熙八年三月"《世祖章皇帝实录》纂修草稿告成，量留纂修等官详加校对，其余纂修官、笔帖式哈番及书办人等，先行议叙有差。"⑮这其实是将当时档案册籍录入实录的粉饰性记述，所谓"草稿告成"，就是申涵盼指出的那个"冗复遗漏者尚多，其讨论润色之功百倍于起稿时"的不成样子之稿。所谓将一些纂修人员"先行议叙有差"，其实就是裁减人员的行为。而"量留纂修等官详加校对"又是怎样的结果呢？申涵盼记述说：

"监修公班布尔善以天潢为首辅，谓《太宗实录》未修，不可以子先父，遂请停《世祖实录》，重修《太宗实录》，八年正月开馆于内院，为内馆，复廪给。而外馆诸臣从此阁笔矣。其才干有望者，皆拔置内馆，凡八员。盼在外馆，外馆皆向盼作不平语，盼每委曲排解之。二月杪，忽取盼入内馆，外馆益不平。盼自矢无私请，且不愿内馆之劳瘁。于是内外馆争不已，而盼竟入内馆。盼素不礼于内馆诸臣，比入，仅啧啧谬相许可，殊不自解也。"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

第一，"执政者"借口清世祖实录草稿已成，停经费、裁人员，为掩人耳目，本来还留下一些官员校对。这"执政者"非鳌拜莫属。而班布尔善则接着找到一个彻底停止世祖实录纂修的理由，即先修《太宗实录》，公然声称"不可以子先父"。

第二，纂修太宗实录者为"内馆"，纂修世祖实录者为"外馆"。内馆待遇优厚，外馆留下几人，早已停止经费，实际也已搁笔。外馆纂修官一半以上抽调入内馆，余下的皆忿忿不平。申涵盼提到"内外馆之分，皆出班公意，实欲借实录以猎封爵也"，可知这种分馆为内外是班布尔善之谋划，但其目的乃是破坏《清世祖实录》的纂修，并非出于"猎封爵"

的考虑。

第三，申涵盼也被调入内馆，虽不向主持者靠拢，却得到赞许，心中十分不解。其实，这是守旧派对他的拉拢。

这些情况明确显示出班布尔善等人利用重修《清太宗实录》，来使世祖实录的纂修废辍，在抗拒康熙帝意图上手段十分狡猾。值得注意的是，据申涵盼记述，班布尔善等人在康熙八年一月之前已经废止了《清世祖实录》的纂修，但《清圣祖实录》于是年三月记载“草稿告成”，必是鳌拜、班布尔善背着康熙帝先已停经费、裁人员，至三月份才上奏草稿告成，只欠校对，企图掩盖视听，蒙混过关。这反映了在《清世祖实录》纂修中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两个月之后，即康熙八年五月，康熙帝经过精心准备、周密策划，一举逮捕了鳌拜，惩办其党羽及阿附者。擒鳌拜的当日，班布尔善即被从“内馆”修《太宗实录》处抓走，次日便处以绞刑。[16]次月，康熙帝便重新诏令纂修《世祖实录》，以秘书院大学士巴泰为监修总裁官，重新开馆，一切程序宛若纂修起始。历经三年，至康熙十一年五月，《清世祖实录》最后告成。康熙朝纂修《清世祖实录》，在鳌拜倒台之前，仍然是直接的政治需要居于首位。鳌拜倒台之后，重点有所转变，已不再具备辅助政治斗争的意义。这是整个《清世祖实录》纂修的两个阶段。

《清世祖实录》修成后，清廷举行了隆重的进书仪式，赏赐与晋升各参与纂修人员。成书的《清世祖实录》144卷，合凡例、目录共146卷，缮为满文、蒙古文、汉文三种文本，是为有完整凡例、有御制序、有进书表的第一部清朝实录，在义例上符合自唐代以来封建王朝纂修实录的义例，而有所发展，即摈弃了在实录中插写重要大臣简明传记的内容。整部实录缮写满文、蒙古文、汉文文本各三套。《清世祖实录》的成书，标志着清朝纂修实录向规范化迈进了一大步，也是清朝官方史学逐步走向规范化的起点。

这次改修《清世祖实录》本身，虽已不具备辅助政治斗争的意义，但纂修这部实录原本是与向鳌拜等守旧派发动攻势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尽快完成纂修，也是整个政治斗争成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摧毁鳌拜集团之后仅一个月，就迅速开馆纂修，说明了清廷的这种意旨。但由于该实录与政治斗争密切联系，改修到完成仅三年时间，在史料考订上尚不缜密，编纂中既采用汉文档案与文献，也采用满文档册，人名、地名译音不同而多有出入。例如《清世祖实录》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四月记述李自成挟明崇祯帝太子“及宗室晋王、秦王、汉王等俱来”，其中“汉王”显误，因明宣宗时，汉王朱高煦谋反，事败国除，此后再未封宗室为汉王。《明史》卷118《韩王传》记载韩王朱亶塉“崇祯十六年贼陷平凉被执”。《清世祖实录》显然是根据满文回译时将“韩王”误译为“汉王”。似这样的实例甚多。[17]

清代前三朝即清太祖、太宗、世祖朝实录的修改问题，曾在史学界引起过注意。而今查考之，改修实录之举，乃自《清世祖实录》为始，改修的原因首先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班布尔善主持下修成的草稿质量低下，已如申涵盼所述，而其中贬抑世祖朝政治的内容也必然不少，改修乃理所当然。但体例、书法规范化的《清世祖实录》改修告成，接着促成了《清太宗实录》的修订和《清太祖实录》的重修，构成康熙朝官方史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太宗实录》初修于顺治朝，成稿后仍存在体例、文字、史事上的众多问题，如人物姓名舛错、史事遗漏、载事冗杂以及未以干支记日等等，只是个半成品，也确有修改的必要。清入关前修成的《太祖武皇帝实录》，在入关后的顺治朝经重新缮写抄录，分为满、汉、蒙古三个文本，并未提出修改意图，但它与新成《清世祖实录》的体例很不一致，所以同样有改修的合理性。但是，《清世祖实录》的改修则为了政治的需要，着意美化顺治朝政与皇帝本人，给太祖、太宗实录的改修以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清太祖实录》的重修在清三朝实录改修中最后完成，与入关前《太祖武皇帝实录》相比已面目全非，尤其是内容中增加了太祖努尔哈赤的不知所据的五十余条谕旨，连同原有的谕旨一并修改得句句文雅，把努尔哈赤妆扮得似乎具备精深的汉文化造诣。这种

改修实录中的粉饰行为，源于纂修《清世祖实录》时因政治需要而形成的美化先帝的修史意识，这种意识与崇重汉文化的思想相结合，导致将清太祖形象儒雅化的作法，而未顾及历史的真实。

在“三朝实录”改纂过程中以及成书之后，清廷又陆续开始了许多新的修史活动，如纂修“三朝圣训”、开设起居注馆记录起居注、开国史馆编修本朝国史、纂修《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等等，这在清代都是首次。此外，还创造了记述战争始末的“方略”之书，如《平定三逆方略》、《平定罗刹方略》等，这是历代所没有过的官修史形式。甚至还特别纂修了《幸鲁盛典》、《省方盛典》，记载康熙帝巡幸孔子故居和巡游各地的盛况，为皇帝本人歌功颂德。这些书史的大量编纂，是与纂修《清世祖实录》而使康熙帝认识到当代史的重要政治作用相关联的。而随着“实录”、“圣训”、“起居注”、“方略”、“会典”、“一统志”、“国史”等史籍的渐次开修，清廷已逐步像宋、明等汉族政权一样，将修史看成国家的一项职能，官方修史格局慢慢形成。官修史书仍然具有寻求历史镜鉴，为本朝君主歌功颂德的政治倾向，但具体的、直接的政治斗争需求已经淡化，《清世祖实录》的修成是一个转折点。

总之，《清世祖实录》的修成，促进了清朝官方修史的职能化、规范化意识，对清官方史学的发展有着较大的推动作用。但实录的改修，特别是《清太祖实录》改修中过多的文饰，表明清官方仍然缺乏尊重历史客观状况的意识。

---

①申涵盼：《忠裕堂集·纂修两朝实录记》。

②《清史稿》卷215，列传二，《济尔哈朗》。

③《清世祖实录》卷119，顺治十五年七月戊午。

④《清世祖实录》卷136，顺治十七年六月己丑。

⑤《清世祖实录》卷144，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

⑥《清史稿》卷249，列传三十六，《索尼传》。

⑦见《清圣祖实录》卷3，顺治十八年六月丁酉。

⑧庄氏史案死者人数说法不一。《郎潜纪闻》载名士221人被杀，而张穆《顾亭林年谱》及节庵《庄氏史案本末》载死者70余人。今采前说。

⑨《清圣祖实录》卷9，康熙二年四月壬子。

⑩《清圣祖实录》卷29，康熙八年五月庚申。

⑪《清圣祖实录》卷22，康熙六年六月甲戌。

⑫《清史列传》卷7，《熊赐履传》。

⑬《清圣祖实录》卷23，康熙六年七月己未。

⑭《清圣祖实录》卷27，康熙七年九月辛亥。

⑮《清圣祖实录》卷28，康熙八年三月甲午。

⑯见申涵盼《忠裕堂集·纂修两朝实录记》及《清圣祖实录》卷29，康熙八年五月戊申。

⑰见黄彰健《读清世祖实录》，载（台）《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二分册，1974年2月。